

药中称"国老"

李显坤



南朝时,医药学家陶弘景尊称一种甜美的小草为“国老”。

人世间的“国老”是什么?是良相。前有管仲、诸葛亮,后有狄仁杰、王安石等,个个都是文韬武略的人中俊杰,治世能臣。

而一株草,居然能够被尊称为“国老”,足见其不同凡响。

小时候在乌尔禾,我认识了一种植物。在沙漠里,或房屋附近的一片荒地里、一条沟沿上,与苦豆子相伴,一丛丛,一簇簇,恣意蓬生着。叶片呈椭圆形,碧绿青翠,用茸毛锁水,以根系织网,在荒凉之中竟是那么恬淡自然,默默无声地耐着高温,抗着风沙。它看上去身姿显得纤弱矮小,不过几十厘米,可扎入地里的根却足有三四米长,最终在干旱中迸发出烟花般绚烂的生命力。

虽然大人们说这是甘草,我们这些小孩子,无一例外,都叫它甜草根。小孩子哪来的耐心,也没有耐力,挖个二十来厘米深,见到了指头粗细的主根时,就会立马拦腰铲断。这就够了,那一截儿甜草根,足以让人咀嚼个小半天,那味道深入咽喉,有别样的甜。小孩子吃甜草根,就似去了菜园,摘几根黄瓜或几个西红柿那样随意。那份随意里,竟不知这原来是一味中草药。

小学四年级时,才听老师在自然课上讲到甘草是味中草药。自此知道了,与每个人都会条件反射所想到的草药那叫一个“苦”字不同,甘草实在是个例外,顾名思义,甘乃甜之意,中药里的说法是性平味甘。

后来年纪渐长,城市里是见不到甘草了,却并未就此断了与甘草的关联。嗓子痛了,泡几片甘草片代茶,便会消了炎症,这就让许多没见过甘草的人,对甘草的味道也毫不陌生。咳嗽厉害时,含服甘草片也极为管用。

与大名鼎鼎的人参、当归等相比,我一度都以为,甘草不过就是一种味道甜美、清热解毒的普通草药而已。

那年一个同学的儿子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,读的是药学专业。假期几家聚会时,偶然提及甘草,这位药学初入门者介绍道,甘草可不是一般的中药,若翻开中医院里每天开出的处方,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方子里都会有甘草的身影。这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。

甘草入药,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仿佛一位隐于市井的智者,人们是逐步加深对其认识的,其价值和地位也随之增高,竟被尊为“国老”。

对此,唐代医家甄权解释道:“诸药中甘草为君,治七十二种乳石毒,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,调和众药有功,故有国老之号。”这说法很具体,透着夸张。不过在陶弘景的眼中,“此草最为众药之主,经方少不用者,犹如香中有沉香也”。甘草以这种令人啧啧称奇的调和诸药的独一无二的功效,获称“国老”之号自然是当之无愧的。

老舍评论《聊斋志异》“鬼狐有性格”,其实中药里的每味药也各有其特性,这体现在中药“四气五味”之说中,仿若一人一性。人参、当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的说法较为权威,上药为君,主养命;中药为臣,主养性;下药为佐使,主治病。“用药须合君臣佐使。”在中医的一般性配方中,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主要药物为君,辅助主药发挥作用的药物为臣,治疗兼症或消除主药副作用的药物为佐,引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谐诸作用的药物为使。就特性而言,甘草是典型的使药。虽中庸,却实在不平庸。

尽管如此,既展现出豪放刚烈的英雄气概,又包含细腻柔情的文人特质的辛弃疾,当年就曾在《千年调》里道及:“寒与热,总随人,甘国老。”这是在质疑甘草的中庸是在做折中调和,尽管这极符合辛弃疾性格里特立独行的一面,但联系前因后果和具体语境,不难看出,其实辛弃疾只是借用甘草这个“百搭圣手”可以随处入方、不拘主药寒热温凉皆能配合协调的特点,来隐喻那些俯仰随流、八面玲珑的世俗小人,进而讽刺那些不分善恶是非,万事皆和稀泥的官员。

事实上,甘草也绝非如此。其寒热随人,能将不同特性的药物综合为一体,从而在治疗中发挥出最佳功效。即便其甜,也是实实在在的,绝不似裹上了一层糖衣故作温柔的甜。这就或多或少地缓和了汤剂的苦涩,便于患者入口。一如管理有方的治世高人。

药界的“国老”,甘草做得名副其实。

有用之物,才具备相赠的价值。北宋时梅尧臣有诗《司马君实遗甘草杖》:“美草将为杖,孤生马岭危。难从荷蓑叟,宁入化龙陂。去与秦人采,来扶楚客衰。药中称国老,我懒岂能医。”司马光将一根硕大的甘草作为礼物,送给了梅尧臣。希望这根甘草能够像拐杖一样,助其抵御衰老。

现今社会中,有一些人保持着辛弃疾讽喻过的、那种毫无原则的事不关己的心态。人性淡漠者之间,总会发生一些令人感叹世态炎凉的事情,更让我愈加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甘草可贵的品格。我觉得甘草始终是甜与苦交织、治愈与伤害的隐喻。之所以能够在荒地沙砾中倔强生长成一剂唤醒敬畏的良药,完全在于其有一种别样的品格和情怀。我希望身边多些有甘草一样品格和情怀的人。在有些方面,我是愿以甘草为师,也应怀以甘草为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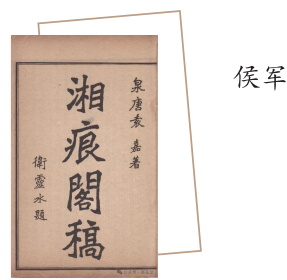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的天津古文化街,是津门文学艺术乃至民间百艺的荟萃之地。这条街上卖旧书的店铺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家,一为文林阁,一为今古书社。前者专营旧书,后者主要经营新版书,卖旧书只是偶尔为之。我之所以刻意把它归于旧书经营的范畴,是因为它“偶尔为之”的旧书业务,却让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把淘书瘾。

我所说的那次“过把瘾”,是指今古书社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搞的古籍旧书大展卖——也许人家还有别的名目,只因我当时已迁居深圳,没赶上,所以不敢妄言。单是这次被我赶上的一大展卖,就足以令我惊叹不已了。那是在1993年冬天,我回津探亲,听弟弟侯杰说起古文化街的今古书社正在搞大甩卖,很多线装古籍论本卖,一元一本。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,转天一大早就跑到今古书社去淘书了。

果然是书堆如山,但是购书者寥寥。这对我等书虫来说,却是千载难逢的“人货”良机。我近前仔细翻检一下,当即明白这里处理的大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石印线装古籍。想必是当年积压的陈年旧书,既占压库容,又推销无望,使得店家不得不“斩仓”清货。遗憾的是,我来得晚,完整成套的古书所剩无几,留下的只是散本零篇,而且被

淘书琐忆(二)

过了一把淘书瘾



先到者翻得七零八落、缺纸少页,看着真让我一阵阵心寒。幸好,书“山”堆得够高,说明深挖细掘尚有潜力,总会遇到别人未曾“开垦”的处女地吧——我就是抱着这种半是怜惜、半是期待的心态,开始步入这条寻觅古书的“山径”。

忘记了时间,也忘记了寒冷(当时店里好像没有暖气,寒冷刺骨),我埋头书“山”,“挖山”不止。直到肚子咕噜噜叫起来,看了一下手表,我才发现不知不觉间,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,连忙检点当日收获,付费归家。那次淘书,可谓收获颇丰,共购得古籍数十册,主要有:

《王阳明先生全集》(两函12册),民国二年(1913)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。为当日我发现的唯一一部完整古籍,因此不能按本论价,店家开价120元,我觉得不贵,当即接受。

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(十卷):共四册,存第一、二、三册,缺第四册。为上海涵芬楼借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钞本影印。

沈括《梦溪笔谈》:残存第一、第四两册。为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本。

苏辙《栟城集》:全书包括《栟城集》(五十卷)、《后集》(二十四卷)、《三集》(十卷),共20分册;当日记尽力搜检,凑得12分册,缺8册。这是我此次在今古书社淘书最为用心、也是最为难得的一部书。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影印明蜀府活字本,字体清秀,十分爽目。收得此书,虽是残缺不全的版本,却正好与我后来在兰州所收《三苏全集》中的《栟城集》相比照,殊为惬意。

此外,还捡得宋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一册,宋陆佃的《陶山集》一册,宋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一册,元代大画家倪云林的诗集一册,清代薛福成的《庸庵文编》一册……

而最令我意外的是,在那一堆从残乱本中,我居然发现了一本完整无缺的《湘痕阁稿》,其作者乃是清代大文豪袁枚的长孙女袁嘉。袁嘉字柔吉,自小悠游于随园中,与众姐妹吟诗酬唱,颇具才华。可惜命运多舛,先是夫丧守寡,后在咸丰三年癸丑之春太平军攻克金陵之际,怕遭凌辱而投湖自尽,竟因水浅求死不得,然袁嘉去意已定,遂服药自杀,依旧未能速死,喘二日方逝。如此命运,真是悲惨至极。万幸的是,在随园后人的众多藏书和文稿均被兵火付之一炬的情况下,唯袁嘉的《湘痕阁稿》被一个晚輩誊出一份抄本,得以劫后犹存。

如今,这本薄薄的诗词稿又被我从烂书堆中翻检出来,拂去尘垢,焕然生辉——我不知道这是书之大幸,还是我之大幸。

“假如你要认识我,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……”我是听着关牧村老师的歌长大的,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够认识她,而且还得到一本她的签名书,这就是她的自传《我和我的歌》。那些无声的文字,却是有声的旋律,读来深受受益匪浅。

这部书,完整记述了一位歌唱家70年的人生与艺术历程。从童年及至青年,中年再至今,回首往事,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,其间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无所不涉,从小我之家到广阔天下,线索就是一个“爱”字,爱无所不在,不是索取,而是给予。

读罢此书,一个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典范跃然眼前,可以看到一个前进者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风雨跋涉的足迹。从艺术领域来说,如果没有天赋,个人的奋斗可能徒劳无益,而拥有天赋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,再加上时代的赐予,极有可能获得成功。关牧村的成功是各种条件的集合,她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,在母亲的殷殷嘱托下,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,终有所成。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她个人的奋斗,倘若一个普通人想有所得,那此书应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,关牧村的成功虽不可复制,但可以借鉴。

这又是一部关于艺术的探索之作。作者回望来路,深刻剖析寸心得失,她正确认识自己,知不足而后进,充满着自省与自励,同时念念不忘与读者、歌迷交流体会,毫无保留,坦诚相见。作者不作夸夸其谈,不说溢美之词,而是尊重历史事实,检点艺术道路的高低不平,形成宝贵的档案。此书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照片,图文相得益彰,读者观之可大饱眼福。书中详细地记述了许多歌曲的创作和传唱过程,这其中不乏许多名的经典案例,限于篇幅不作具体介绍,只说解决了我一个困惑的事,这就是很长一段时间,我一直不知道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结尾一句为什么有两种版本,一种是“走向那结婚登记处”,一种是“一起走向那绿色的雾”,我读此书才知道后者是关牧村所改,前者稍显直白,而后者则更为含蓄。书后附有《我的艺术年轮》,是作者自编的艺术年谱,喜爱者和研究者直观可见。

在自传之外,这也是一部时代史。作者将个人的发展置身于时代的脉动之中,也融入社会生活之中。她谈及述往而不忘他人,书中用大量篇幅谈到与众多歌迷歌友的互动细节,她念念不忘她的师傅、工友和帮助过她的人们,她深深爱着养育她的天津,也感恩给她教益、在她成长道路上提携帮助她的常兆铺、彭维刚、蒋杰、张志、常宝华、王昆、施光南、于淑珍、冯骥才、周小燕、沈湘、南炳文等人生不同时期的师长。她还写到了热心公益、关注民生的件件往事。

我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,关牧村的歌声伴随我的成长,我一直是她忠实的歌迷。在我青年时代,我的腰间常挂着一个“随身听”,耳机里灌满她的歌曲,翻来覆去,几乎听遍她公开发行的歌,那些歌曲陶冶了我的志趣,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,帮助我度过了难忘岁月中的—些艰难时刻。

如果一位诗人或者歌唱家,能有三首五首乃至十首代表作品,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,而关牧村的代表作则远超十首这个数字,她高产,名曲众多,那是因为她

的传说,那究竟传说是否真实呢,乾隆皇帝究竟来没来过杨柳青,他在杨柳青又有哪些真实的历史发生,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呢?

明代万历年间的京师西城指挥使、南京刑部主事蒋一葵的文集《长安客话》中记载:“杨柳青地近丁字沽,四面多植杨柳。”明代诗人唐之淳写下《杨青驿》,“杨青驿前杨柳青,马头南去船北行。”从一些诗词和《杨柳青镇志》中,我们可以了解到,早在明代就设有杨青水陆驿站,地点就在杨柳青。地方行政长官一直就是巡检兼驿丞。同样在明代,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,也从淮安出发,坐船经大运河进北京“谒选”,路过杨柳青,因品尝杨柳青的饮食,写下了名篇佳句《杨柳青》:“村旗夸酒莲花白,津鼓开帆杨柳青。壮岁惊心频客路,故乡回首几长亭。春深水涨嘉鱼味,海近风多健鹤翎。谁向高楼横玉笛,落梅愁处醉中听。”种种迹象表明,“杨柳青”一词,在清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了,所以“乾隆赐名杨柳青”就是一个美好的传说,表达了大家美好的愿望,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。

那乾隆到底来没来过杨柳青呢?据史书记载,还真得来。提到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个杨柳青的地名——胡羊庄。胡羊庄是杨柳青镇25个行政村之一东碾吨嘴村的村中村,在东碾吨嘴村以南,现在杨柳青泽杨道、西青区中医医院新址旁边。传说胡羊庄在明永乐年间后期成村,当时有一胡姓老人在此放羊,故名,清朝时隶属静海县北路,那时候还没有“西青(西郊)”一说。1951年,因为村庄太小,所以胡羊庄与邻村东碾吨嘴村合为一个行政村。

据《清实录》也就是《大清历朝实录》及专门记录乾隆皇帝活动的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记载,乾隆一共有六次到过杨柳青,分别是:第一次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,农历二月初三,乾隆带着皇太后从圆明园出发,巡幸山东。二月初八,御舟驻跸胡羊庄。第二次,是这次巡幸山东回来后,农历三月二

十六日,御舟再次驻跸胡羊庄。第三次,是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为庆贺小金川战役胜利,在二月,乾隆带着皇太后再次巡幸山东。二十九日,御舟驻跸胡羊庄水营。第四次,是此次回程途中,农历四月十六日,乾隆御舟再次驻跸胡羊庄水营。第五次,乾隆五十五年(1790)二月,乾隆巡幸山东。回程途中,农历四月初六,御舟驻跸胡羊庄。第六次除了记录乾隆经过杨柳青外,还对杨柳青人对乾隆的欢迎做了描述: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农历三月十三日,乾隆自圆明园启銮,巡幸天津。二十三日乾隆御舟经过杨柳青夹河地方。居民踊跃欢迎,爱戴之情溢于言表。二十四日乾隆降舆:因杨柳青居民热烈欢迎他,所有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都免。其原文如下:“谕,昨日御舟经过杨柳青夹河地方。该处居民踊跃欢迎,情殷爱戴,殊属可嘉。所有该村庄本年应征钱粮,亦着加恩普行蠲免,以示朕惠恩施,有加无已至意。”(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)

杨柳青有很多关于乾隆在此地的传说故事。在如今杨柳青御河道上,有一座名为“御赐园”的园林。里面有乾隆和刘墉的铜塑像,和他们相对的河岸边还有一座浣纱的杨柳青女子雕像,这里也有一个民间故事。当年,乾隆帝与刘墉坐船经过杨柳青,乾隆见河岸边有一洗衣的杨柳青美貌女子,目不转睛,刘墉调侃世间什么“力量大”,寓指“女子可以使龙颈扭弯”,也就是皇帝目不转睛,船过了,还在扭头看“美女”。这则故事实为借刘墉之口,说出了人们对乾隆帝的调侃,也间接应和了“杨柳青出美女”的说法。

清代杨柳青有18道水局,就是民间有组织的消防机构。最早的消防机构“天安水局”的传说也和乾隆皇帝有关。说的是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泰山降香,路过杨柳青,驻跸“围栈”,围栈就是简易休息场所。一次围栈不慎失火,差点酿成大祸,杨柳青地方士绅出主意,建立“支更水会”,值班防火,后取“天子平安”之意,建立了杨柳青首家“天安水局”。

关于乾隆帝的传说故事,还有一则就发生在“夹河湾”。乾隆的船过杨柳青夹河湾,因船搁浅,无法行走,身穿黄马褂的侍卫都无法挪动船只,恰逢柴人杜万顺路过,在水中用肩膀撼动御舟。乾隆大悦,赐名杜天顺,赏赐黄马褂,认作“义子干儿”,随行护驾。

乾隆与杨柳青

谢连华



开可见细密如丝的纹理。据早年间志记载,明太祖定都南京后,胥河畔的田赋多了一种辛香料,固城姜自此成了船工行囊中的常备。如今艮老鸭汤若不放拇指大的姜块,老辈人总说汤色欠了三分澄黄。

胥河水运衰于明清,至民国时东坝船闸犹在。去

姜暖胥河

诸纪红



梅雨时节父亲披着蓑衣劳作的背影。就像汪曾祺先生晚年惦念高邮的茨菰汤,我这北漂的高淳人,书案上永远供着半块风干的老姜。

河面上传来货轮的汽笛声,载满新姜的船正穿过下坝船闸。两千五百岁的胥河依旧青春,而当年那个嫌姜味儿冲鼻的少年,早已在异乡的烟雨里,活成了半块倔强的老姜。

我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,关牧村的歌声伴随我的成长,我一直是她忠实的歌迷。在我青年时代,我的腰间常挂着一个“随身听”,耳机里灌满她的歌曲,翻来覆去,几乎听遍她公开发行的歌,那些歌曲陶冶了我的志趣,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,帮助我度过了难忘岁月中的—些艰难时刻。

如果一位诗人或者歌唱家,能有三首五首乃至十首代表作品,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,而关牧村的代表作则远超十首这个数字,她高产,名曲众多,那是因为她

都说高淳人爱姜,早年间在胥河畔住过的人家,灶台上总少不了碗盐水的嫩姜芽。街坊们开玩笑说,若是谁家媳妇赌气回了娘家,汉子只需在门前晒起姜干,那掺着阳光的辛香味顺着河风飘散,保管把馋嘴的娘子引回家。

高淳人晒姜的法子古早,竹匾里铺满浅黄姜片,像把胥河畔的秋色收进其中。我记得母亲晾姜时爱哼小曲,她总说姜丝晒得透,来年烧鱼才压得住腥。那时我总嫌她絮叨,如今隔着四十载光阴回望,才明白那一匾匾姜片里,藏着游子走不出的乡愁。

胥河边的沙土最养姜。老辈人常说,这得谢伍子胥开河的传说。相传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率军民开河运粮,虽史家对此尚有争议,但胥河两岸的沃土后来确实滋养出漂洋过海的姜芽。前些年见日本客商来收姜,专挑两指粗的“观音指”,说是要切片当刺身配菜。高淳人听了直咂舌:“咱们腌嫩姜的粗姜,倒成了他们的稀罕物。”

要说姜中滋味绵长的,还得数固城湖畔的老姜。这老姜须生在胥河冲刷的沙土中,皮色淡黄,芽尖透白,掰